

018388

中国古代 北方民族文化史

民族文化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民族文化卷

张碧波 董国尧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哈尔滨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

民族文化卷

主 编 张碧波 董国尧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继钦 李俊武 吴援朝 张泰湘
赵一德 黄凤岐 穆鸿利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禹浪 冯继钦 刘以焕 李俊武
李建勋 吴援朝 吴文銜 和晓驰
陈可畏 罗矛昆 张泰湘 张碧波
赵一德 钱伯泉 黄凤岐 喻权中
董国尧 薛英群 穆鸿利 暴鸿昌

《民族文化卷》撰写分工：

绪论 张碧波

第一编：

第一章 舒顺林；羯族文化：陈可畏

第二章 陈志贵、米文平；柔然文化：曹永年

第三章 冯继钦

第四章 冯继钦、黄凤岐、孟广耀、杜承武；奚族文化：冯继钦

第五章 叶新民、翟国强

第二编：

第一章 张泰湘、黄凤岐、李俊武

第二章 魏国忠

第三章 李殿福

第四章 张 高

第五章 李建勋、穆鸿利、李 成、崔广斌、刁本庆、阎景全

第六章 张玉兴

第七章 董国尧

第八章 黄有福、金 香

第三编：

第一章 陈可畏

第二章 戴春阳

第三章 陈可畏、薛英群

第四章 吴景山

第五章 王 辉

第六章 张俊民

第七章 罗矛昆

第八章 钱伯泉

第九章 余振贵

第十章 穆鸿利

2

序 言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付梓在即，很荣幸，我受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组编委会的委托，为本书作序。虽感汗颜，但众望所期，只好勉为其难了。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一书是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题目之一，也是黑龙江省“七五”期间承担的唯一重点课题，经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九省、市、自治区几十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民族文化卷终于出版了！

文化史，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史，本是学术领域中一个薄弱的环节，由于资料的匮乏，成果阙如，一直是许多学者不敢问津的领域。而本书的作者能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吸取多学科的成果，其中包括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比较语言学、艺术科学等，吸收了近几十年的新成果，汇集了众人的智慧，终于使这本书问世，使我国百花齐放的学术园地里增加了一枝秀丽的奇葩。它的出版应该说是一个多学科、多层次联合攻关的结晶。同时它的出版也必将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对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广袤无垠的北方大地上，亘古以来就生活着众多的操不同语系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不仅创造过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创造过璀璨绚丽的精神财富，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很可惜，在我国历代的史书上对他们的文化史记载或描绘很少，或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做了许多不正确

的描述,这是十分遗憾的。本书的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完成了这项科研任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东北亚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不论从历史的纵向看或横向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正当我国改革开放之际,其作用与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文化上的交流必然带来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对我国与世界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交流的契机与条件。

众多的学者在目前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不为金钱所动,淡泊志远,孜孜以求,甘做改革开放的基石与桥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本课题组组长张碧波教授是我尊敬的师长,他原本是研究文学史的,对文学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张教授在近花甲之年勇敢地挑起重担,把文学与史学科学地结合起来,开创了北方民族文化史一门新学科,团结了三北地区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排除了重重困难,毕五年之功力,终于完成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大作,填补了中华文化史的空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创举,这是值得祝贺的。

我原是文物战线上的一名小兵,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多年,对民族史、考古学、文学都怀有极大的兴趣。由于形势的需要,近年转向了企业,在我奔走于经营、管理的纷杂的业务时,仍念念不忘我的师长与学术事业。我想,在市场经济发展之时,大家不应丢掉文化财富的创造。经济的繁荣必将带来文化的繁荣,我希望企业界的朋友都来关心学术事业的发展。在学术战线上我虽然还是一名学生,但我也要在学术领域里尽我所能,为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李俊武

1992年11月

绪 论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是1986年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

建国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以及其它的诸种原因,造成了中华文化研究在内容上的狭隘性与观念上的片面性,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在中华文化的构成与创造性的贡献等问题,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未能科学地探讨北方民族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华文化史作出全面而科学的研究与评价。我们认为,中华文化史的研究需建立在对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没有区域文化研究,没有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吸收、总结与概括,是谈不到中华文化史的研究的。

北方民族及其创造的文化是一历史文化,不容忽视。自远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北方边疆大漠南北,即包括现在的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自古至今生活着许许多多游牧、渔猎以及农牧结合的民族,他们虽然族属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也有差别,但是,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辽宁西部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遗址,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史前遗址考古发现,其中最早的文化遗址较仰韶文化尚早1000多年。据此,考古学界提出了北方文化区问题,指出了北方(三北地

区)古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北方各族的先民在史前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三代秦汉以降,北方各族与中原民族接触频繁,不断融合,中古以来,继匈奴族之后,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等相继建立地方政权,蒙古族、满族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融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的文化传统,保持了一种旺盛的活力,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文化历史现象。因此,所谓中华文化史,实际上应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史的总和,而北方各民族(区域)文化的贡献则占据着显著的位置。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充分应用已掌握的史料,阐述北方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轨迹,揭示北方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探讨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认识北方文化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写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北方民族文化史,是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文化可以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全部复杂关系种种表现形式的总和。文化史的研究,正是19世纪以来,人们要从总体上把握、认识人类自身,调节、改造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新型学科。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有了多半个世纪的历史。早在3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尹达根据考古发现,提出了存在着长城以北文化区域的观点。以后以中国北方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逐渐为学术界所承认。近来,考古学界对辽西红山文化和甘肃大地湾文化的研究,得出了我国史前有两大文化区系的结论:即中原农业文化区和北方草原文化区。北方古文化不是中原古文化的衍生或地方变种。据此,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可以从地域上、人种上、语言上给予界定,有其独特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从而体现了作为文化区系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当代中国现实中,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塑造新文化的历史实践,是基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反思。它有利于加强今天的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民族的和睦团结,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最根本的条件。考察北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北方民族文化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判断与分析,揭示北方民族文化在构筑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与中原农业文化碰撞接触、交流融合的发展规律,认识中华文化构成的复杂历史过程与传统特征,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将有利于造就一支新型的科研队伍。它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也涉及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这种跨学科研究将锻炼出一支具有综合学科研究能力的学术人才队伍。

总之,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在于塑造新的文化,在于指向未来,在于反省我们文化传统中已有的东西,以便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对既定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与形态描述,主要的在于进行文化哲学的评介,在于提高人们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开题的根据。

我们的课题任务是在中华文化的整合的基础上对北方民族区域文化历史的考察,揭示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发展形态,并在区域的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上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民族传统的认识,为研究中华文化史奠定基础。应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化与整合的基础上揭示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形态,揭示其在中华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一具有开拓性质的学术课题,它

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是巨大的,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三北学界的协作攻关,因此它的研究任务与组织任务都是艰巨的。

一、北方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它包括50多个民族单位)经过几千年的复杂历程,经历长期的自在的民族实体阶段,到近百年来,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与之相对应,中华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文化史是一个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它是在中华大地上多元的民族单位的世代的无穷的连续系列中形成的,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一元中包含着多元),从一元又走向多元的对立统一过程,最后形成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历史地理的生态环境制约着甚至决定性地影响着民族文化格局。中华大地是一从西向东逐级倾斜的斜坡,西部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东接横断山脉,形成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由西南到东北的半圆形高原带,海拔2000米至1000米;接下则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地带及沿海地带;东北则为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和东北平原。中华大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东西落差形成三级巨大阶梯,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这既决定它的起源的本土性,又形成了极其不同的多种生态环境,构筑了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和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区系。

^①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中,在相邻相近的文化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中,以及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原因而造成的部落迁徙中,中华文化经历了三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三个经济文化区:长江流域及其南部的稻作农业文化区;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东北、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畜牧渔猎文化区。^①由于中华大地幅员广大,自然地理条件极为复杂,这三大文化区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三大文化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各文化区域之内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是多元的,不平衡的,从而形成相当复杂的文化谱系。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作过综合考察,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的重要理论观点。佟先生认为:“中国大陆东部有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接触地带:一是阴山山脉;二是秦岭山脉;三是南岭山脉。这三条山脉都是东西走向,每条山脉的北侧和南侧,分布着不同的文化,故名为接触地带。”经过综合比较研究认为,“在北纬40°——42°之间东西横亘的阴山山脉,是阴山以北狩猎经济类型诸文化和阴山以南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经济类型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在北纬32°——34°之间的秦岭山脉以南及其余脉桐柏山脉和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东西一线,是黄河流域以粟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和长江流域以稻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的接触地带。”“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江流域的诸文化虽然均属稻作农业经济类型,但是南岭以南属亚热带气候,气温高,雨量多,稻作的收获量应是较多的。所以在北纬25°——27°之间的南脉以迄武夷山脉,是长江流域诸文化与珠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②这是

① 参见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②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从地理历史文化系列与经济类型文化系列方面对文化的多元特征进行论列的。说明地理历史面貌和生产经济类型对文化区域的形成以及对文化发展的制约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现有资料考察论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初步形成了四个(或更多)大的文化区域(或称文化区系),这就是阴山山脉以北的北方文化区域(后来发展为草原游牧渔猎文化),阴山山脉以南、秦岭山脉以北的黄河流域旱作农业文化区域,秦岭山脉以南、南岭山脉以北的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区域和南岭山脉以南的亚热带块茎种植文化区域。

这诸多文化区域并非一个文化系列,而是各自形成文化系列,各有诸多文化系统中心,这些文化区域和各自的诸多文化系统就是我国若干民族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并形成独自的文化个性、文化内涵,它们是民族文化区的基础。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由于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之变化与制约,如气候之由暖变冷,降雨量之由多变少,以及土地条件、河流变迁等等,使一些地区适于农耕或农耕与游牧结合,而一些地区只适于游牧。由于民族本身的发展,如生活能力(生存与繁殖)、体质变化、民族间的战争,形成部落联盟的运动速度等等。这二者相互作用,制约与影响(甚至带有决定性)这一文化区域或文化区域中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速度,影响着这一文化系统的性质,从而出现了文化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基于此,出现了文化系统中心的变动与转化、转移;出现了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交流、融合;出现了文化系统之间的叠压。这种相异的(或相近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叠压,是不同的(或相近的)文化层次之间的撞击、打破、交流与融合,进而形成新质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的特质,出现了文化系统的先进与落后

的发展差距；出现了某一文化系统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并成为各文化系统中心的中心，各文化系统由多元向一元转化，逐渐形成中华文明的初期形态。这一元文化包容着多元的内容，而多元文化系统仍在继续发展，但却接受一元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这种多元与一元的相互制约与转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又一基本规律。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指西北、华北的仰韶，北辛——大汶口文化与东北的新乐文化，华南的河姆渡文化，大坨坑文化）显然都在地域上向各方面扩张而彼此作了有意义的接触，而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开始呈现规模广泛的类似性，这些类似性指明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交互作用圈与附近地区其它交互作用圈之关系相对立。……虽然自北到南，在中国可以辨认出来好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但这些文化显然全都是同一的交互作用圈的成员。这一点最显著的可以自它们共有的陶器特征上看得出来，这些特征有时可以称为‘龙山形成期’的作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四千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①

这种在中华大地虽相隔而实相联的区域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交互作用，相互关联，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成一个整体单位，即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横向联系。而多元文化发展为一元文化，诸地区、诸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承传，又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纵向联系。这种文化上的横向与纵向的交叉发展，正是中华文化之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接触文化（或称连续性文化），它是由内陆高原文化与东北亚草原文化、海岱文化交感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这种多元文化之交感激荡，多元文化之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2页。

叠合——冲击、碰撞、交流、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

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融合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原华夏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华大地的中心地带，与周围各种文化接触激荡，吸收融合，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它在各文化区系中脱颖而出，最先具备文明条件，率先迈入文明大门。夏商周三代不同源，三代文化的叠合——碰撞、交流与融合，形成华夏文化，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文化网络，奠定了以中华疆域内部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

这个多元文化统一体一经形成，便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秦汉之后称之为汉文化），历经诸多民族的努力，构筑成以汉族为主体、多元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

三代华夏文化的形成，造成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诗经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东西南北的大循环，形成文化的多元碰撞与交流，造成诸子时代与楚辞时代。

秦汉文化走着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整合过程，从多元走向一元，而与匈奴的战争，又使一元文化向多元发展，从而构成秦汉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这是汉族的形成时期，是从以华夏为中心扩大发展而成以汉族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的对峙、碰撞与交流，使文化在多元辩证中发展，继匈奴族之后，鲜卑、氐、羯等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来。这为多元文化走向一元——隋唐文化的全面高涨准备了基础。

唐代文化最具中华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特点，也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结晶。它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一元性的统一，它的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特征，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典范，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典范。

宋、辽、金、西夏、元是多元文化大发展时期。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先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在中原北部、西北部地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辽、金、西夏与宋形成对峙的文化局面；然后是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造成宋元文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更为突出。

明代是继宋、辽、金、西夏、元开放之后转为封闭的时代，这已不是旧式的封闭——已不可能。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指出当时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明代文化虽由多元走向一元，但文化的融合开放势头不可阻挡，文化新质不断涌现。

清代，北方统一南方，北方民族第二次统一中国，尽管它“没有轶出过去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但这时期的文化仍遵循多元辩证发展的规律，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文化高涨。而到清中叶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减弱，封闭性逐渐加强，最后走上完全封闭的道路，清王朝走向彻底的覆亡，中国封建社会也走完了最后的道路，中华文化史由此而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北方区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按照文化区域界说应有的系统性与严肃性，北方文化区域，指大兴安岭以东、以南、以西，天山以东，燕山、阴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脉以北，阿尔泰山脉以南的以高原、丘

陵、大漠、森林草原绿洲为主的广阔狭长地带；蒙古利亚种华北型为主的人类圈，以阿尔泰语系为主的各民族各部落联盟。

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适于农耕，而北方为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多为森林、草地、戈壁，适于渔猎畜牧业。农业区与畜牧区各自产生相适应的文化，形成内涵差异的文化圈。秦汉中原大统一，与之相对应，北方也出现了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大统一，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并峙局势。

北方区域文化自有其与黄河中原文化相对应的发展序列。这里仅以分布于内蒙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以及吉林西北部的红山文化为例，给予简略说明。

辽宁省喀左县大城镇东山嘴大型原始祭坛遗址和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遗址的发现为举世所瞩目。

据发掘报告，^①遗址中心，是北部一个巨石所砌的平面作长方形的方框，即所谓“大型方形基址”，中间立了一大堆长条石头；在这方形基址外又套一个东西约24米长的更大的石头方框。遗址南部，是一些石头砌的圆形台，也称石圆圈。考古学家认为它不是有房顶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平台式祭坛，整个山嘴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宗教场所。

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遗迹群，是继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已出土了“女神庙”的泥塑人像、玉雕猪龙等重要文物。已发掘的四座积石冢，均以石垒墙，以石筑基，以石封顶，然各自的形制、构造与性质不完全相同。以三号积石冢为例：“总体布局平面呈圆形，冢基底面为构成同心圆式的三圈石桩。……三圈石桩地面水平高度不一，外圈最低，中圈高于外圈近0.4米，内圈又

①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高于中圈近0.3米。如此分三层递收、叠起，构成一个形制似‘坛’的圆形整体。”^①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宗教遗存。那种“方形基址”与“圆形祭坛”或圆形积石冢相配合所显示的原始的天圆地方以通天地的宇宙意识；那种在积石冢群中突出中心大墓，在女神群中众神并列、围绕主神为表现形式的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及其所折射出来的有组织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孕妇塑像，“头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②所显示的原始生殖崇拜与母权崇拜的强烈反响等等，都说明辽河流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国文明的发源地。

距今五千多年前，正是我国各地区文化碰撞、交流、融合、渗透的历史时代，红山文化作为北方文化系统的一个中心，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系统中心相互对峙。这种区域文化系统之间的内外交融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东山嘴的大型原始祭坛、牛河梁大规模祭祀中心的出现，“说明在西辽河流域，早在五千年前，就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③也正是这个阴山山脉的接触地带、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和东北平原孕育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入主中原的民族。

徐中舒先生也曾指出北方民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他说：“余疑古代环渤海湾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

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②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 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文中所引为苏秉琦在辽宁兴城所作题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报告中的论点，载《文物》1986年第8期。